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保卫历史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主编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Edited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郝名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第1000号 (CIP) 目录编查并图

保卫历史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主编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Edited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郝名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革命理论主义思想史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伍德，
[美]福斯特主编；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9.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ISBN 978-7-5097-0598-8

I. 保... II. ①伍... ②福... ③郝... III. ①马克
思主义-研究 ②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A81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4196 号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主编：伍德·福斯特·伍德 [美]
译者：郝名玮·米拉贝·伍德 [美]

Ellen Meiksins Wood, John Bellamy Foster, editor

In Defens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Copyright © 1997 by Monthly Review Foundation

本书据每月评论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文库

*

主编 陆象淦

总 序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洗和考验，却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如果说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681页。

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当前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无疑首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着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从新世纪和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最新成果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理论交流与联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势必要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检验。关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其中虽然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观点和论说。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近20年来其格局出现了诸多变化。一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欧洲的一些原本实力很强的共产主义大党出现急剧分化，党员数量、动员力、影响力锐减，在经过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纷纷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和反思。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问题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阵

营的首要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开始了新的集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在1993~199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地召开了“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等一系列参与性很广的国际会议。其中由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筹备和组织、欧美的十多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刊物共同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定期化,成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从1995年迄今举行了五届,参会者愈益增多,包括了欧美和亚非拉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涌动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演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临时化和失业阴影的笼罩、生活的不稳定、阶级和种族矛盾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越发突出,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正因为如此,欧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着重探讨阶级关系、种族矛盾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四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极其广泛和密切的网络联系。以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为例,它自称“既是一个刊物、一套丛书、一个研究和聚会的场所、一个研究小组,又是一个向经常性的讨论开放的网址、一个在线论坛、一个国际网络”。它又在2002年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多家刊物一起创建了称为“K计划”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欧洲网络”。“K计划”这个名称,取自德语“阶级”(Klasse)、“资本”(Kapital)、“斗争”(Kampf)和“共产主义”(Kommunismus)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贡献”。这个“K

计划”网络又是作为“世界社会论坛”欧洲分部的“欧洲社会论坛”网络的组成部分。五是研究组织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派别界限淡薄，观点呈现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今日马克思》杂志和丛书的主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雅克·比岱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今天之所以对西方青年一代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因为它“不仅是分析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而且前景广阔”。其迫切的现实价值还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当前的全球化阶段重又凸显出其初期的野蛮性……虽然有着再度扩张的闪光外表，却又显现出没落的征兆”。^①

总之，当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虽然仍处于一个分化、聚合、动员、调整和整合的过程，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有益探讨、分析和见解。本着进一步开阔眼界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问题为主线，重点译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解读及对当代世界分析探索的著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探索的涌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关的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问题，深入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创新才有所可能。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2008 年 11 月于北京

① 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Introduction, PUF, 2004.

目 录

导 论	何谓“后现代主义”?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 1
-----	------------	----------------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者们来自何方?	特里·伊格尔顿 / 21
-----	--------------	--------------

第二章	语言、历史与阶级斗争	戴维·麦克内利 / 32
-----	------------	--------------

第三章	文化研究与政治	弗朗西斯·穆尔赫恩 / 51
-----	---------	----------------

第四章	文化、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艾杰兹·阿赫麦德 / 61
-----	-----------------	---------------

第五章	老主张与新需求：历史、阶级与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布赖恩·D. 帕尔默 / 77
-----	-----------------------------	-----------------

第六章	反对从社会层面对科学进行解析： 来自第三世界的警世故事	米拉·南达 / 88
-----	--------------------------------	------------

第二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运动

第七章 阶级问题和文化问题 艾杰兹·阿赫麦德 / 115

第八章 种族问题的真实写照：后现代主义与
宣扬差异 凯南·马立克 / 131

第九章 后现代主义、男女平等主义与马克思：
来自深渊的信息 卡罗兰·A. 斯塔比尔 / 156

第十章 马克思与生态环境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173

第十一章 北方的知识分子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丹尼尔·努金特 / 190

第十二章 五论当代马克思主义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 204

后 记 保卫历史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213

作者简介 / 226

导 论

何谓“后现代主义”？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多次终结的现代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撰写了他那著名而令人不快的书《西方的没落》，宣告西方文明及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终结。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和传统正在断裂，团结一致的生存状态正在消失，共同的思想和文化亦随之渐次消亡。他认为，西方像其他所有经历过各自固有周期的文明那样，不可避免地从其（已无效用的）“理性”渐衰期过渡到了充满个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终结期。

大约40年后，C. 赖特·米尔斯宣称“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时期之终结期”。“继”现代时期“而来的是后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历史遗产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启蒙运动对靠理性和自由而共同进步的信念和以此信念为基础的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已丧失其价值，难以再对世界和我们自己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了”。J. S. 穆勒和马克思都过时了。^①

①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之应变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65～167页。

无疑，这两次时代终结之宣告——一次是1918年，一次是1959年——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斯本格勒对民主怀有敌意，而米尔斯则持激进主义；斯本格勒敌视启蒙运动（抑或至少是态度暧昧），而米尔斯则坚信启蒙运动价值观（然而也有点绝望）。而连年的经济萧条、战争和种族灭绝大屠杀等等灾难过后也出现了物资富足的景象：这物资富足的景象使人类至今最为恐惧的心理得以消除，而那连年灾难则使人类失去了充满幻想的希望。

斯本格勒撰写《西方的没落》时，欧洲的确是陷于一片混乱，战事连连，革命不断，更不用说大民主的开展使统治阶级即使在没有革命冲击的情况下也受到了明显的威胁。米尔斯所处的时代则完全不同。1918年后世界所经受的恐惧要比斯本格勒所能想象到的大得多；而米尔斯是在平安无事的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日趋繁荣（“丰裕社会”）时期、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氛围中从事写作的。他当时所教授的那一代大学生虽然仍生活在冷战和核威胁的阴影下，但享有无限美好的物质生活前景。

当时，资本主义的这一“黄金时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①如是说）实际上使米尔斯同一代的学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无视迈克尔·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国”，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了）都相信：西方社会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社会和谐的条件大体上已具备了；启蒙运动的进步梦想大体上已实现了；至少可以说人们所预料的、甚或所期望的也莫过于此了。这正是米尔斯的同事丹尼尔·贝尔（他在其后出版的那部名著中对米尔斯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背弃了古巴）所称之为的“意识形态之终结”。

^① 在霍布斯鲍姆的《极端时代：波涛汹涌的20世纪，1914~1991年》（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95年）中，“黄金时代”（约1947~1973年）介乎“灾难时代”与“山崩地裂时代”之间。

因此,对米尔斯说来,对启蒙运动不再持乐观态度并不是某种明显的灾难所导致的结果。正相反,他的悲观情绪源自成功而非失败。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大多已经达到:社会、政治组织已“合乎理性”;科学技术取得了就连对启蒙运动持最最乐观态度的理想家也想象不到的进步;先进的西方社会教育大普及等等。

米尔斯断言,这些进步并未增加多少人们“实际上的理性”。“理性化”、官僚政治和现代技术非但没有增进人们的自由,实际上反而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甚至是许多想象不到的罪恶之根源。“理性”与自由之间这种不一致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是出现了异化的人群(或曰快乐的机器人):这些人随遇而安,使自己适应于其无法控制和感到无法控制的外在条件——庞大的组织和超强的力量;这些人已失去了要求自由的欲望和谋求理性的愿望。

其中有些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例如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长期来一直在研讨的。对启蒙运动疑疑惑惑、对进步持悲观态度是20世纪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左派如此,右派亦如此,动机有好也有坏。然而米尔斯时期的情况不一样,这一现象与失败没有什么关系,与(明显的)成功——二战后长期的繁荣,“福利”、“消费”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则大有关系。

左派认为繁荣乃既成事实,谁也不能否定,此乃资本主义常态耳。这一认识是左派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大决定性因素。许多批评左派的社会学家——马库斯是个最好的例子——确信这一新型资本主义已完完全全迷住了“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米尔斯敦促左派放弃“劳工原理体系”,认为工人阶级再也充当不了反对力量了——这样认为的人肯定不止他一个。就连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亦持类似的观点。渐次突出学生和知识分子、强调“文化革命”、视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反抗

力量、再也不重视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观点，成了20世纪60年代“历次革命”以及学生激进运动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主导思想。^①

60年代“历次革命”后的十年间之繁荣确然消失了；但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停滞期里，其知识遗产留传了下来。这知识遗产中有另一种“后现代性”。这会儿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将现时代作为后现代性时期进行分析研究并找出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称为“后现代派”。虽然他们表示是受了种种影响——从像尼采这样的早期哲学家到像拉康、利奥塔德、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一些近现代思想家的影响，但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主要还是属于60年代那一代人及其学生们的。这一后现代主义不管多么强调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新的（“后福特主义的”、“组织不善的”、“随意变通的”）形态，但仍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形成的一种意识之产物。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似乎并未注意到繁荣的终结，他们太过专注于资本主义的胜利和消费主义的乐趣。而就是那些已然意识到当前现实情况的人也相信资本主义必胜、共产主义已亡，他们的思想源自那“黄金”时代。而在一些右派人物宣告“历史的终结”或资本主义最后胜利的同时，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也在对我们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生活在了“后现代”时期；“启蒙运动构想”已失效；原有的真理和意识形态统统过时了，全都不再适用了；原有的理性原则过时了，不再有用等等。

诚如我们随即所意识到的那样，是否能对这一新后现代主义进行某种历史分析还很无把握。但如果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后现代性”的确是个历史时期的话，那么实际

^① 我在载于《社会主义录》1995年的《现在谁是老派？》一文论述过其中的一些新情况。

上的分水岭当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虽说历史长河之水自古至今奔流不息,但对后现代性所作的研究分析结果十分令人惊异:与早先激进派和反动派双方所宣告的终结至为雷同。换句话说,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非连续性中的连续性——抑或至少是重复性。如果我们再次得出一个历史终结的结论,所终结的历史显然不是另一个不同的时代,而是同一个时代的延伸。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这种辩证关系并无惊人之处。20 世纪里明显的时代断裂其实是受资本主义(颇具活力而又危机重重、终结了无数次的制度)逻辑——及其内部矛盾——制约,处于同一历史单元的。

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

然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早先对时代终结期的分析之间有着一些重大区别。“现代性”的终结至今一直被看做是种历史态势,易受历史演变的影响,甚至会受政治活动的影响,得应用历史知识对之进行分析。当今的确有这么一些像戴维·哈维和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视其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其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①我们也许不赞同他们的这种历史观,但我们至少可以同他们进行有关历史的辩论。然而不管怎么说,“后现代主义”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① 例如,参见本论文集里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五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一文以及戴维·哈维所著《后现代之状况》(牛津:巴塞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0)。我在载于《每月评论》第3期(总48期)(1996年7~8月)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还是资本主义?》一文中论述了这些后现代性理论,认为这些后现代性是种历史征候。

首先得概述一下“后现代主义”左派（我使用这一名称意在广泛涵盖近年来涌现出的、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内的种种思想倾向和政治潮流）所论及的一些最重要的课题。后现代主义者们心里只有语言、文化和“论述”。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来，这似乎就是说人们及其社会关系完完全全是由语言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构成的；或者可以这么说，语言就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整个世界，我们认识不到其他真实的东西。其最极端的“解构派”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沿用了语言学理论所提出的种种公式化语言——据此，我们使用的语言内存结构限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是以类似于语言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指导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和方式类似于主导着语言的语法规则（或曰其“深层结构”）。社会并非只是类似于语言，而就是语言；由于我们完全受制于我们的语言，所以除了我们完全接受的特定的“论述”外，所有的外在真理标准、外在的有关知识对我们毫无用处。

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虽说仍坚信“论述”的重要性，但可能不将语言置于这种首要地位了，只赋予其“单词和言谈”意义了。然而他们还是坚持知识的“社会意义”这一看法。坚持这一看法表面看来似乎无可非议、甚至是公认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得到人类知识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语言和社会实践这种媒介获得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们似乎想得比这一还讲得过去的论点更为极端。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认识论最为鲜明的论点是他们的科学知识观。他们甚至认为西方科学——建立在大自然受某些普遍的、永恒的、确凿无疑的规律所支配这一信念之上的科学——正体现了支撑着西方社会的帝国主义压迫准则，而除这种极端的观点外，后现代主义者们——不是有意识的就是头脑不清、思想糊涂——惯于将知识的表现形式同其对象混为一谈：就像他们不仅（例如）说物理学是种历史性的概念，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